

談

「現代法國問題論集」

羅惠光

著者：陳三井

出版者：學海出版社

出版時間：66、10、5

頁數：二三四頁

國際關係瞬息萬變的今天，各國基於本身的利益考慮，往往從「現實政治」觀點出發，從國家安全乃至於立足於國際社會，多善用外交手腕，以遂行最符合己身利益之政策。諺云：「外交乃是內政的延長」，此時國際局勢已邁進多元時期，而軍事力量已不再似已往兩極強權的鼎立狀態。當前形勢除美、俄、中共等國，在世界上形成所謂「優勢力量」，在歐洲方面法國亦已擔任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僅在「共同市場」居中樞地位，而在「核子俱樂部」中亦儼然以強國自居。法國自戴高樂執政乃至於目前的季斯卡領導，實已形成一不可忽視的「地位」，此是關心世局發展者不可不多加留意的。

「現代法國問題論集」一書的出版，實為自由中國關心歐洲形勢發展的一項智慧結晶。

本書著者陳三井教授，目前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並兼任師大、淡江文理學院教席。早歲考取公費留學，負笈巴黎，在法國多年，觀察法國社會局勢，留意法國政情演變，極具心得。後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於民國五十八年起，以留法歸國學人身份，在國際關係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不斷地研閱最新資料，並不斷提出研究成果，其中除了有關於政策性的分析或建議，提供當局作決策參考之外，並撰為有關法國問題的論著，大部份在「問題與研究」月刊上發表；以治史的態度，剖析法國問題，論述言之有物，言必中肯，對於關心法國問題的人士而言，已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貢獻。

本書計收錄了十七篇文章，分別從「外交關係」、「政黨政治」、「武器競賽」等主題，探討法國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經濟各方面的發展，從深入淺出的文筆以及資料搜集豐富、研判分析俐落的立論來看，實足使人對法國現代面貌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與認識。在「外交關係」方面收錄了七篇文章，「從法國與情看承認中共」一文，實代表着中法關係史極重要的一刻，透過陳先生的說明，更讓人明白當時政府決策與與情醞釀產生的結果。民國五十三年一月，法國的戴高樂政府正式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作者將此一事件的醞釀、交涉經過，從法國與情的三種態度做一個綜合剖析；贊成者從一、良知；二、中國與法國的緊張局勢已告結束；三、外交的獨立；四、為世界和平着眼；五、中國廣大的市場等說法出發，大放厥辭；另一派「批評的態度」則認為「建交」將導致一、西方聯盟的動搖；二、法國的孤立；三、法國為中共鋪路。第三派則採「模稜態度」，認為：一、別人比我們先做；二、承認並不意謂贊同；我們為美國人服務。誠如作者所說：「種種立論雖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要亦可幫助吾人做『知彼知己』的功夫。」輿情（Public Opinion）的表現狀況，以及本文所提供的資料，竟成做為史家研究的參考，亦可協助國人對於此一中法關係史上的「賭

注」行爲作一瞭解。

在「政黨政治」方面，收錄七篇文章，其中「從戴高樂逝世看今後法國動向」是頗有歷史價值的文字。戴高樂的一生多采多姿，繫法國國運幾達三十年之久，其於世局的變化亦舉足輕重。正如法國哲學家孔德所說：「死者支配生者。」此文敘述強人的一生及未完成的回憶錄，並討論北約與美法關係、法國與共同市場、英法核子合作問題。法國觀察家認為戴高樂的死，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公民投票的失敗，第二階段才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的壽終正寢。陳三井教授明確地指出：「衡諸法國國情，戴高樂政策今後恐怕仍將支配法國，如果它是合乎法國人的利益，合乎法國人的立場的話；沒有戴高樂的法國政府，在作風上或可能比較平實。態度上可能較易於打交道，但若希望其改弦更張，作大幅度的轉變，那是緣木求魚的想法。」今日季斯卡政權的領導法國，基於政治利益，依然有建立光榮法國的「理想」，這是我們必須加以正視的。

在「武器競賽」方面，收錄「法國的核子武器發展」、「法國軍火外交」，探討法國軍事政策與措施。法國於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舉行第一次原子試爆。當時，戴高樂興高采烈的說：「好呀！從今天開始，法國是更強，也更自由了。」基於政治的動機、國防的需要、地理的考慮，法國不願國內外輿論的交相譴責，不惜以舉國之力，從事核子試爆至今。綜括說來，法國是個民族自尊心極高的國家，爲了國家安全起見，又不願仰仗大國鼻息，或許由於戴高樂說過：「法國就應該是法國。」核子武器因而成爲法國一項重要的憑藉；除非法國左派拿權，法國是不輕易放棄核子武器的發展，更由於追求「政策自決」與「行動自主」的獨立外交政策，法國的核武政策將一貫執行；陳三井教授亦曾指導研究法國問題的研究生，從事此項研究工作；由其寫來，自然立論確切，評析有力。

本書收錄「留法歸來的中共黨徒」一文，對於探討中共的興起，實具有極大的意義與價值。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運動的興起，外在（法國）的助力比內在（中國）的助力為少，本文闡釋頗為清楚。從學生赴法的思想起源說起，作者指出：「中國學生大批赴法，可以列舉若干實際的理由，加以解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不久，由於法國勞工短缺，導致人力市場供不應求，適合外人前往工作；二、當時法郎對銀圓的兌換率，有利於中國；三、法國生活情況，即使日漸轉壞，但仍然勝過遭受內戰破壞的俄國。」作者並說明留學生在法國的一般生活情況，諸如「留法儉學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的提倡設立；作者亦指出：「人們有時候認為：在歐洲受過訓練的中共領導者，他們的世界觀比『本土主義者』（像毛澤東）的世界觀，較為廣濶。我們很難分析這種假說，尤其是像現在的美國人一樣，缺乏和中共之間的個人接觸。但是把他們分成『本土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也很難有可靠的依據，來判斷他們的世界觀。」詳閱本文，即知此篇揭開中共歷史上，一段未被埋葬而鮮為人知的插曲，可促使我們對於整個淵源作一透澈的瞭解；他們所倡導的運動並非產生於像上帝安排好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土地上；事實上，它萌芽於一個普遍反對民族主義的時代；也就是說他們所倡導的運動，一方面導源於西方和世界主義者，另一方面也導源於中國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本書的撰寫，引用相當份量的法方資料，並詳加剖析，作者多年嘔盡心血的結晶，功力由此可見；從新穎的資料引用與考據問題的眞象，終於將「中法關係史」上的一些昧暗不明的癥結加以理出一種穩當、詳細的「史實重建」；筆者認為研究歷史，當窮根究底，本着求真、求實的精神出發，不僅是歷史的紀錄，更須詳加探究其因果關係與影響，以便成為後人的「教訓」與「通鑑」。本書以歷史學者的眼光撰寫，自然詳瞻精實，是頗值一看的好書。